

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

毛禹霖

[摘要] 十九世紀下半葉，隨着晚清農業危機的加劇，水旱災情不斷爆發，發展近代水利設施日益成為當時社會所面臨的重要議題之一。鄭觀應作為近代水利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重要見證者與參與者，在傳統農業經驗和近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基礎上，先後撰寫了《救時揭要》、《易言》以及《盛世危言》中的一系列水利篇章，用以闡釋和梳理發展近代水利的主旨和途徑。這些水利篇章主要關注引進歐美先進技術、學習近代科學理念和改革官僚制度等問題，主張在發揚傳統水利思想的前提下，引進歐美的先進科技，實現傳統智慧和近代科學的融合；堅持自強求富是發展近代水利的主旨；認為因地制宜是發展近代水利的要訣；推動制度改革是發展近代水利的途徑。

[關鍵詞] 水利 現代化 制度改革 鄭觀應

同光年間，剛剛經歷了一系列戰火洗禮的中國滿目瘡痍，而咸豐五年（1855）的黃河大改道又致使黃河中下游河道屢屢決口。此外，光緒元年（1875）爆發的丁戊奇荒也使華北各地的情況雪上加霜。面對如此艱難的局面，身為地方紳商的一員，鄭觀應積極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呼籲向歐美學習，大力整治河道，興修水利設施，推動農業的發展。作為晚清傑出的思想家之一，鄭觀應敏銳地意識到近代中國水利建設的重要意義，並由此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水利思想，本文即圍繞着鄭觀應水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進行探索。

一、鄭觀應水利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咸豐黃河大改道以後，華北地區陷入了水災不斷的困境，而全國各地頻繁爆發的起義又使清廷焦頭爛額，根本無力大規模修築黃河的堤壩。同時，河水的泛濫和連年的戰爭也導致中國的農業經濟蒙受沉重的損失，水利設施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多年的戰火嚴重削弱了各地水利工程的防災抗災功能。在天災和人禍的雙重壓力下，中國迫切地需要為當時的水災水患問題尋找到一條可行的治理途徑，而鄭觀應的水利思想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時局下孕育而生的產物。

在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的《救時揭要》中，年僅三十二歲的鄭觀應就對當時全國各地水患頻發、城鎮農田被毀被淹、沿岸百姓顛沛流離的慘狀進行了比較確切的描寫：“或

作者簡介：毛禹霖，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研究生。

兩廣常被水災，或長江時罹水患，黃河水決，清水潭崩，哀鴻遍野，慘不可言。”^①除此以外，左宗棠也在光緒七年（1881）的奏稿中描述了當時華北各省水旱災害頻發、百姓生活困苦的社會情況：“畿甸地方，年來旱潦頻仍，雖經多方修浚，尚無明效……不得水之利，徒受水害。竊慮及今不治，則旱潦相尋，民生日蹙，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②艾新軍還根據孟昭華和彭傳榮編寫的《中國災荒辭典》附錄〈中國災荒年表〉統計得知，僅僅光緒一朝，中國就爆發了三十一水災和二十次旱災。^③

面對全國各地的水患問題，清廷的治河措施無論是在策略謀劃還是在執行落實方面，都具有十分明顯的局限性和落後性。這種陳舊的治河舉措不僅無法從根源上遏制洪澇災害的產生，而且還使本就仰賴地方紳商募捐的治河經費被貪官污吏進一步虛耗、浪費。清廷的顛覆證明了傳統的治河思路和整治手段已經完全不能應對晚清時期的水患問題。

一方面，就整治水災的資金而言，清廷除了調動官方的力量進行救濟以外，還在南方各省積極動員地方紳商進行募捐，為受災地區提供資金上的支持，周濟災民群體，“國家體恤元元，重施恩惠，而天下急公好義者，亦莫不仰體宵旰憂勤，輸將恐後。若廣東一省，所助賑銀約計四十餘萬，上海亦二十餘萬，其他各處捐款不勝枚舉”。^④王超就曾指出“以經元善、鄭觀應為首的社會慈善家們開始了發動民間力量參與救災活動的先河。從此，在政府‘官賑’以外，民間‘義賑’也成為救災賑濟的重要力量”。^⑤

另一方面，就治理河流的措施而言，清廷籌集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堤壩、加固堤防。清廷不但屢次從國庫中調撥款項，呼籲地方紳商進行募捐，花費重金對河道進行修繕，而且還特別委任重臣通盤謀劃治河策略：“臣擬於十二日親履工次察勘地形水勢，與直隸督臣李鴻章、署順天府尹臣張凱嵩，會籌修築疏浚一切事宜，務臻妥慎。”^⑥但是，面對河堤決口的問題，清廷長期只採取嚴防死守的措施，以修復和加固河道堤防為第一要務，忽視了其他相應的配套治理工作，堵塞缺口便是治河的主要乃至唯一的任務：“旋經直隸官憲設法修復堤工，以免後患。群以畿輔之地，今年縱不能復原，似亦不致如去年之困苦矣。”^⑦如此顛覆應付的政策自然無法真正彌除河流泛濫的隱患。況且，連年的用兵還導致清廷十分困窘的財政狀況，經費的短缺嚴重限制了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建設和治河措施的落實，這使本就已經過時、單一的整治策略更加難以發揮其效力：“但值廢弛已甚之後，官民交窘之時，迥與康熙、雍、乾間情事不同，僅能量力補苴，實無從更張大舉。”^⑧

^①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2。

^②[清]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頁23。

^③艾新軍：〈鄭觀應防治水旱災害思想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赤峰），第3期（2010）。

^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2。

^⑤王超：〈淺議鄭觀應的救荒思想〉，《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瀋陽），第1期（2008）。

^⑥[清]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頁31。

^⑦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2。

^⑧劉憶江：《李鴻章年譜長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68。

單一的治理措施、猖獗的貪污問題使清廷的治河政策不但未能徹底解決水患問題，反而給日後洪災的爆發埋下了導火線。

首先，清廷專注於用泥土加固河堤，此舉不只變相地降低了河流兩岸土地的高度，而且在河床泥沙不斷沉積的作用下，河流自身的海拔也越來越高，最終河水必然壓垮之前修築的河堤，引發較之以往更加嚴重的洪澇災害。由此而產生的地上河現象在黃河下游的直隸省境內最為突出：“直隸之水源派繁多，宣洩不暢，乃不事疏導，專事堤工。其需土也，勢難挖河中之泥，則必挑掘就近田地。迨至明年，而堤上之土漸坍入河，又必掘田以修之。似此年復一年，堤身既高，河身亦與之而俱高。河身愈高，田地遂因之而益低。加以渾水灌清，濁沙淤塞，勢必致河變為田，田變為河。由是論之，非築堤也，實填河也。河既填矣，高田數倍，水性之就下，安得不犯濫而妄行乎？”^①

此外，清廷腐朽的官僚體制也使賑災所需的白銀不單被各州縣的貪官污吏私自侵吞，而且這些官吏還將更多的賦稅進一步分攤到了每一位災民的頭上，這使得遭受水災侵襲本就一貧如洗的災區民眾生活更加地困頓：“尤可駭者：去秋水災，哀鴻遍野，皇上軫念民依，撥款賑濟。乃聞灤州、樂亭各州、縣將賑銀扣抵兵差，聲言不足，仍向民間科派。災黎謀食既艱，又加此累，多至轉於溝壑，無所控告。是民非困於災，直困於貪吏之苛政也！”^②

二、鄭觀應水利思想的核心內容

為了應對河流泛濫和農業蕭條這兩大危機，鄭觀應一邊主動向歐美學習，積極引入外國的工程技術和科學理論，另一邊又從傳統的水利智慧中汲取經驗，推動官僚制度改革，最終孕育出了獨特的水利思想。圍繞着歐美先進技術、科學理論與官僚制度改革這三項核心內容，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呈現出不斷豐富的發展態勢。

（一）先進科技是鄭觀應水利思想中的技術保障

面對全國各地水災頻發的嚴峻挑戰，鄭觀應積極呼籲引進歐美各國的治水經驗和技術，為探尋嶄新的河流治理思想打好了基礎。對於困難重重的河床清淤任務，鄭觀應提出“不若以外國之法治之，蓋西人挖河，以機船在河中挖起淤泥，即以其泥填高堤壩。法甚便捷，且所浚較深。倘能仿而行之，將見從此河流安穩，永無沖激之患矣”，^③即仿照歐美，使用新式的機器輪船進行清淤工作，以保證清淤工程的進度和品質。此外，他還進一步提議借用荷蘭的風車來運輸河水：“宜用荷蘭風車之法，使水一歸於海，而多築高堤，以為捍禦，庶有所障蔽，不至河決即成澤國。”^④使用風車能使泛濫的河水迅速地奔流大海，而不至於堤壩一旦決口就只能任其波及各省。同時，鄭觀應還希望在發生旱災的時候，通過風力取水的方式，從深井中引水灌溉農田，以減少旱情所帶來的農業損失。“至如平曠

^①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7。

^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42。

^③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3。

^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4。

之區，可仿泰西風車之法，以代人力之勞。遇旱則掘深井，以風力汲水，灌溉田疇；遇潦則開水道，以風力戽水，導注江海。工程既省，晝夜弗輟”。^①

除此以外，鄭觀應還非常清晰明瞭地指出了河流的泥沙淤積和河床的逐漸增高對河堤造成的顯著不利影響。在這一思路的引導下，他在《盛世危言》中旁徵博引了歐美各國的成功治水案例，詳細闡述了自己主張的建設水庫、使用風車、清除淤泥等一系列新型治河手段：“一日緩上游。河之上游，諸山峙立，當於山下鍤塘，谷裏通渠，引水停蓄……一日開支河……取泥之法，可參用泰西挖泥機器船……一日宣積澇……荷蘭治水之法：岸設大風車，逐水歸海……一日開大湖以蓄水。”^②通過體系化的講解和分析，指出治河的訣竅在於調節河流的流量和清除河床的淤泥，二者缺一不可，必須學習歐美各國，齊頭並進才能取得治水的成效，如“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決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無論何國之河，當制其水勢之盛而去其淤，方為妙法”。^③

（二）官僚改革是鄭觀應水利思想中的制度保障

在制度改革方面，鄭觀應檢討了過去河道官僚體制的弊病和漏洞，建議任命有治河經驗和才識的人員主持河道事務，他認為：“治河之官，要有專長，必先甄別其學，明試其才。可以坐言而起行者，乃授之以官。由是重其職守，專其責成，治有成效，勿屢更調。”^④同時，他還準確地把握着過去河道官僚在水患治理過程當中的方法問題，並且一針見血地點出之前的官僚只注重堵塞大堤的缺口，不顧河流未來決堤的可能性，施政鼠目寸光、只求苟安的毛病。他認為這樣的治水策略不但不能真正地解決河流泛濫的難題，反而會虛耗朝廷的公帑，造成官僚體制的貪污腐敗：“今之治河者，不過襲白圭故智，築堤防，增壩埽。每逢秋決，則人力難施，所費金錢直如恒河沙數。故論者謂：河工一項，乃國家之漏卮，而官場之利藪也。”^⑤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鄭觀應進一步地補充了自己的思想，他認為只要沒有治水的能力與學識均不能擔任河道官員，以免影響治河政策的成效，造成資金上的浪費：“蓋河道有分合之處，有起伏之源，有宣洩之歸，倘兢兢然率由舊章，即廉潔奉公，斷難奏效。其不肖者，則循行故事，虛糜國帑，侵入宦囊。故從前河工各員視為美缺，則其剋減之多，苞苴之厚，不卜而知。”^⑥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鄭觀應還特別提議效法元代的先例，向各省派遣一名官員專門負責農業、水利事務，以測量和記錄各州縣的水利設施情況，並對這些水利設施加以修復和增建，以保障各地水利設施的正常使用和運行：“然後略仿元人之法，每省簡一大員為水利農田使，輕車簡從，分行各州、縣，測量繪畫，舊渠之宜復者復，新渠之宜開者開，

^①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87。

^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9。

^③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23。

^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3。

^⑤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5。

^⑥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7。

必順人心，必隨地勢，著有成效，優獎超升。”^①

（三）近代科學是鄭觀應水利思想中的理論支撐

從學習近代科學理論的角度上來看，一方面，鄭觀應在《易言》中強調開鑿溝渠、建設水利設施，然而，他認為除了推行傳統開渠鑿井的辦法外，還可以因地制宜、博採眾長地引進英國人在印度修築水池、對外售水的方法，以爭取獲得更大的成效，如“英人於印度高地築塘蓄水，寬數百頃，按時開放，售之於民。中國及東洋本有鑿井築池之法，均可傍收博採，因地制宜”。^②另一方面，亦對治理河流上游根源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考，鄭觀應認為治河的要訣在於利用樹木鞏固土壤，避免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同時建設水庫以調節河流的流量：“惟於山上多種樹木，水可遲留，即山潦盛發之時，藉以稍分其勢。且水必需攔，蓋宜於山下鋤塘，谷裏開溝，引水入塘，暫為停蓄，旋注諸河。倘本河不能宣洩，則開溝引歸別河；若上游塘水必由本河通流，不能另穿別路者，可在本河兩邊開溝受水。皆用堰閘啟閉，隨時蓄放，庶河流迂緩不致橫決。”^③所以，鄭觀應積極提倡學習歐美等國的植樹造林經驗，呼籲通過培育樹木的方法保持田地土壤的濕潤和鄉野空氣的水分，進而保護農作物的生長，降低旱情可能導致的損失，“惟有樹以吸水，則枝葉固茂，且陰森之氣，又浸淫而生水，自上而下，歸於地中，土脈愈潤。上下呼吸，長養不窮，雖值旱乾，猶不至於速槁。倘忽然得雨，將前此未盡之水氣，合後來之雨澤，接續滋榮，尤為神速。若無樹之田，水口較遙，不能平地引入，即時雨偶降，而水性就下，苗根入土，不過數寸之多，水已入地尺餘，吸引無資，涸可立待”。^④故而，鍾祥財曾說過：“鄭觀應農業思想的顯著特點之一是主張仿效歐美各國，實施現代的農業生產方式。”^⑤

在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中，他始終鼓勵培植樹木，宣導學習歐美等國的種樹經驗。鄭觀應清楚地認識到在田野之間培育樹木不但可以使田地的土壤變得豐腴，水汽更加充沛，還能夠收穫良好的木材，加固河堤河岸，防止水患災害的發生，對於農業的長遠發展有利無弊：“泰西數十年來於種樹之事極為盡心，特設專官如古者虞人之職。自樹木廣植後，不特名材美木獲利無窮，且樹旁之田瘠者變而為腴：因樹根能吸土膏，能爛沙石，故礪確之地悉化膏腴也。無水者變而有水：因樹木能放養氣，能潤本根，故乾燥之區咸資灌溉也。而且根株盤沙，沙石化為土壤，鬆脆變而堅凝，牆岸益堅，提防愈固，則禦旱禦水無所不宜。”^⑥

三、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

從《救時揭要》的刊行到《盛世危言》的出版，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伴隨着時間的推移

^①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6。

^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6。

^③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6。

^④中山市人民政府：《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46。

^⑤鍾祥財：〈鄭觀應的農業思想初探〉，《古今農業》（北京），第1期（1992）。

^⑥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6。

不斷完善，展現出了豐富的時代特色。這些水利思想有的來自於鄭觀應自身的遠見卓識，有的則來自於其所身處的晚清中國社會。歸根結底，鄭觀應的思想不單單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動盪和危機，也展現出了鄭觀應在面對這一系列社會變局時所擁有的進步理念。而這些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則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強求富是發展近代水利的主旨

庚申之變以後，清王朝逐漸出現了一股迴光返照式的中興氣象，而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也借機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在此期間，鄭觀應以自強求富為思想主旨，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水利思想。這一思想主旨不僅反映了洋務運動對鄭觀應水利思想造成的深遠影響，也映射了鄭觀應本人在思想發展道路上對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不懈追求。

張大偉曾說過“鄭觀應思想的核心是富強救國，要求清政府實行一系列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防災備荒思想正是他改革思想的集中體現”。^①而鍾霞也曾指出：“憂患意識是鄭觀應荒政思想的主線。”^②所以，關於水災水患對晚清社會秩序的衝擊，鄭觀應一開始就有着十分清晰的認知，他曾直截了當地將水患問題所帶來的破壞與當時全國各地的戰火相提並論，並且指出洪澇災害已經成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心腹大患，“俗云：‘世有大患者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賊’”。^③同時，鄭觀應也清楚地認識到治理水患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因為消弭水災不但是農業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社會穩定的必要保障，更是自強求富的必由之徑，所以救災止災不只是一時的社會任務，也是追求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基礎：“患未成而杜之於先，患既成而弭之於後。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國泰民安，而天災亦鮮矣。富強之道，不在是哉！”^④

（二）因地制宜是發展近代水利的要訣

為了遏制全國各地頻頻爆發的洪澇災害，恢復和發展慘遭戰火破壞的農業經濟，鄭觀應不只從河流治理和農業復甦兩個方面對其水利思想進行系統性的歸納和闡述，而且還考慮到了近代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他立足於晚清社會的現實情況，因地制宜地推動中國近代水利的發展，為探索獨特的水利思想鋪平了道路。

一方面，從治理河道的措施來說，面對京杭大運河長期淤塞的實際情況，鄭觀應指出要重視疏浚鎮江到台兒莊、以及德州到天津的運河河道，使黃河與京杭大運河之間可以相互調節水量：“考運河淤塞之由，其弊端總在黃河改向。昔日黃水濟運，今則運水反以濟黃。欲治此河，必須統籌全勢，分別繪圖，洞悉情形，方有把握。一由鎮江至台兒莊六百七十里地，設法疏通；一由山東德州至天津六百里之遙，妥為整頓。”^⑤此外，鄭觀應也對大運河北段的地上河現象十分關注，他曾非常尖銳地點出運河北段的河道治理不能只仰賴於

^①張大偉：〈鄭觀應防災備荒思想探析〉，《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牡丹江），第4期（2007）。

^②鍾霞：〈論鄭觀應的荒政思想〉，《廣西教育學院學報》（南寧），第6期（2002）。

^③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2。

^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頁403。

^⑤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6。

過去單一的疏浚措施，因為運河的河面高於海面，海水已經無法接濟乾涸的河道：“查山東以西至新黃河接界之處，斷非深浚可以為功，實緣河與海平，則應挖河以收海水，因勢利導，挹彼以注茲耳。今運河反高於海，即使深浚，又安能使海水逆行乎？”^①

從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來說，鄭觀應曾經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疆域遼闊，各省自然條件差異懸殊，西北內陸常年乾旱，東南沿海卻頻頻水災，所以他強調農業水利設施的建設事關國計民生，不可輕視。“天災流行，何國蔑有。然事後而始圖補救，何如事前而預切綢繆。況事關國計民生，當軸者尤宜先務之急也。今西北各省，迭遭旱荒，東南復多水患。若不專心農政，設偏災偶至，何以禦之”？^②

（三）制度改革是發展近代水利的途徑

19世紀下半葉，鄭觀應逐步為晚清社會的水利建設勾勒出了一幅制度改革藍圖。這幅藍圖不只符合當時農業發展的需求，也體現了他從宏觀角度推動晚清水利近代化的企圖。無論是在濫砍濫伐的問題上還是在民眾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問題上，鄭觀應都着眼於尋找其長期的社會原因，並由此推動制度層面上的改造。這也說明近代水利的發展離不開制度上的革新。

首先，對於當時水利設施匱乏，各種自然災害不斷的深層次原因，鄭觀應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他表示：“自粵、捻構亂，燕、齊、晉、豫諸省所有樹木斬伐無餘，水旱頻仍，半由於此。”^③他明確點出連年的戰爭對自然環境帶來了巨大的破壞，而毫無止境的濫砍濫伐更使中原、河北各省水土流失的情況雪上加霜，自然條件的惡化是導致全國各地水旱災害頻發的長期原因。此外，鄭觀應還從中國社會自身的痼疾着手進行分析：“然而小民不知遠計，各便私圖，非官為倡率之則苟且因循，年復一年而荒廢愈甚，遇有災歉則坐待賑濟，或相率逃亡，比戶荒涼，滔滔皆是。且開渠則各惜尺寸之地，種樹則謂非旦夕之功，可與樂成，終難圖始。蚩蚩者氓大抵然矣。”^④鄭觀應認為普通民眾的短視與無知使得各地的水利設施缺乏建設，樹木種植的推行更是無從下手，除非官府率先宣導，否則極難打開局面。民眾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問題嚴重阻撓了水利工程的興修和維護工作。

然後，針對以上羅列的種種深層的社會問題，鄭觀應提出了很多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的制度革新，以進行預防和補救。其中，對於全國各地的濫砍濫伐現象，鄭觀應提議建立起一套近代化的植樹造林制度，責令新設的農業水利官員對植樹事務進行督導和管理，務必廣種樹木，懲處濫砍濫伐的人員，而新種樹木所產出的農作物則應該用於增加人民的收入，每十年再由官方組織樹木的砍伐和售賣，最後將所得的利潤全部收歸為水利設施的修繕經費，即“可責水利農田使，相勸督率於田側隙地，廣植林木以復舊觀，有斬伐者罰賠不貸。至於蠶桑之利及松、梓、果、蔬一切有利之植，尤必隨時廣種，以厚民生，歲歲增加。

^① 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6。

^② 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87。

^③ 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7。

^④ 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7。

十年則官伐而售之，仍以此款修理川塗，廣興水利”。^①對於普通民眾缺乏維護水利設施和種植樹木等意識的問題，鄭觀應則提議設立近代化的法律法規，仿造歐美等國訂立保護樹木的制度，同時在地方上設立樹藝局，派遣士紳到鄉野間宣講種植樹木的技藝和用途，增強人民植樹培土的意識，即“西例：凡伐一樹，即須補種兩株。立法甚美。今各省既興礦務，築鐵路，所需木料日多一日，亟宜明定章程，責成地方官設樹藝局，招致勤廉士紳，專講種植，要使境內無曠土，無童山，其利澤溥長何如也”！^②因此，滕秀梅就曾表示鄭觀應“從不孤立地談農業改良，而是把農業改良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教育制度和經濟發展等因素聯繫起來，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時救國方略，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豐富的思想內涵”。^③

四、鄭觀應水利思想的時代特徵

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晚清社會爆發的一系列的危機迫使鄭觀應去尋找一條適合當時中國水利建設的嶄新道路。從同治末年的《救時揭要》到光緒年間的《盛世危言》，二十多年的時光和閱歷塑造了鄭觀應自己的主張，也打磨了他的思想。最終，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鄭觀應將中國傳統的農業智慧和歐美先進的水利技術進行結合，孕育出了一系列帶有着濃郁時代色彩的水利思想。

（一）鄭觀應思想內的傳統性

與同一時代背景下的王韜、左宗棠相似，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着很強的傳統色彩，而這些濃郁的傳統元素主要來自於鄭觀應所借鏡的前人智慧和水利經驗。當然，這些傳統因素在鄭觀應思想持續深化的過程中又不得不與來自歐美的先進理念相互交融，並最終成為了其水利思想的共同組成部分。

王欣瑞和周偉曾強調“中國傳統的農業思想是鄭觀應農業思想的歷史基礎”。^④在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他一直強調古人的農業智慧對今天水利設施的發展具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在水利工程的防災抗災作用上，鄭觀應專門指出三皇五帝時代的井田、溝渠制度就對晚清時期的水利建設具有着良好的借鑑意義：“伊古以來，禦旱防潦之法莫善於黃帝之井田，大禹之溝洫矣。何則？平原千里，川渠畎澮，經緯相通，大雨時行，容水有地，河流順軌，潦不為災。及乎雨澤不時，旱暵為患，而溝洫所積之水浸灌有餘，滋潤土膏，流通地脈，苟非七年之旱，未足以困我烝民也。”^⑤在治理洪災、疏浚河道等問題上，鄭觀應也同樣以前人的經驗作為榜樣，不論是雍正朝重臣李衛

^①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7。

^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7。

^③滕秀梅：〈試析鄭觀應的農業改良思想〉，碩士論文，南京農業大學，2010年，第31頁。

^④王欣瑞、周偉：〈鄭觀應農業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晉中），第6期（2020）。

^⑤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5。

的疏浚政策還是夏代大禹的洩洪方法，都能被他引以為自己治河主張的歷史依據：“雍正朝，李敏達公疏云：天地之有江河，猶人身之有血脈，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黃河西北之水，由高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奪。故神禹治水，止言疏引，順其性而利導之。《尚書》所載無庸瑣贅。然洪流浩瀚，洶湧奔溢，急則沖刷無底，漫則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導、或防，惟於此處可施作用耳。”^①

與鄭觀應效法古人、挖渠開荒的觀點類似，同為晚清傑出思想家的王韜也贊同效仿古制，裁汰軍丁，改兵為農，以開闢荒地，同時招攬全國各地流離失所的災民，開墾農田，使他們得以自食其力：“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遺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為農……如近日遇水旱荒災，饑黎載道，朝廷賑恤維艱，勢不能終給，莫若徙流民以實空地，使之自食其力。”^②同樣，作為清廷重臣的左宗棠也曾在光緒七年（1881）的奏摺中表示治理河流的要訣不外乎在上游開鑿溝洫和在下游疏通河道兩種辦法：“治水之要，須源流並治。下游宜令深廣，以資吐納；上游宜多開溝洫，以利灌溉。”^③此外，左宗棠還特別強調貫徹落實疏浚河道、挖掘溝渠政策的重要性，他認為必須力排眾議才能成功達到治理河流的效果：“惟治水之功，有創有因，有修有浚。其施工之處，如河身循舊者，尚可免異議相干；至創開新渠，則事體攸關。”^④

（二）鄭觀應思想的創新性

與身為清廷重臣的左宗棠相比，鄭觀應敢於大膽地創新。不管是在疏浚河道上，還是在興修水利上，積極吸取了歐美的成功經驗，為探索近代水利發展道路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同時，他還試圖在遏制洪災的基礎上，為當時中國農業的長期發展尋覓到一條近代化的途徑。這種思想上的創新性使得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帶有着濃厚的近代化色彩。

高寅城曾表示“鄭觀應的荒政思想就是想要通過先進機器、技術與理念的引進希圖改變中國之現狀”，^⑤在疏浚河道、修築堤岸方面，他極力主張仿照歐美等國，利用機器輪船清理河床上的淤泥，借鑑荷蘭的風車、岸堤等技術，使用風力運水、大堤預防的方式，將氾濫的河水運回大海，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⑥王韜在這一方面也抱持着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治河挖沙離不開歐美的先進技術，只有浚通河道，開鑿支流，才能真正做到消弭水患：“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積，然後多分支流以殺其勢。”^⑦而左宗棠卻與兩人不同，他仍舊堅持依賴過去的傳統方法，將大量的人力資源投入到河道的疏浚工作中，力圖借助軍隊的力量，築成堤壩，浚通河道，整治水患：“臣擬飭所部現駐張家口各營……其左營督帶、前福建藩司王德榜，及臣親軍營總理營務處鹽運使銜知府王

^①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24。

^②〔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9。

^③〔清〕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頁23。

^④〔清〕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頁27。

^⑤高寅城：〈鄭觀應荒政思想研究〉，碩士論文，江西師範大學，2009年，頁29。

^⑥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6。

^⑦〔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9。

詩正，所帶官弁勇丁尚兩千餘員名，應即由張家口、懷來縣現駐之處，順桑乾河流節節疏築至蘆溝橋西，察看河道情形，次第施治。”^①而在興修水庫，種植樹木方面，鄭觀應和王韜也顯然比左宗棠更具有遠見卓識。鄭觀應特別指出整治河流可以效仿尼羅河的治理經驗，在黃河上游的蒙古地區建設人工湖，以調節黃河四季時節的河流流量並灌溉周圍的農田，使人工湖既可以預防黃河的水災水患，又可以促進上游地區的農業生產和發展：“又埃及之尼勒河，昔日為患尤甚於聖桑羅。夏季約瑟執政，於其國之東南掘一大湖，湖名梅利。自此歷數千年不為患。則甚矣開湖之為益大也！”^②同時，鄭觀應還呼籲比照歐美的成功經驗，在田野周圍多種樹木。如此一來，即便連日無雨，田地裏的農作物也不至於立刻枯萎，土壤也不至於馬上龜裂，“西人謂：成頃之田，四圍須多種樹……在上者果能廣為勸諭，令民於畎畝之旁，有樹者增益之，無樹者補種之，將雨澤雖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③而王韜在興修水利方面同樣贊同借助歐美科學技術的力量，他認為利用好外國機器可以使農業開墾、溝渠建設事半功倍：“開阡陌、深溝洫，興水利，資灌溉，或濟之以西國機器水火二氣之力，務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④但左宗棠在治理水患本源的問題上卻依舊着眼於在上游地區挖掘溝渠，劈山開石等傳統的途徑：“現飭前福建藩司王德榜，會同直隸委員鄒振岳、孔慶篤，臣軍委員冒沅等，從蘆溝西北探源而入，詳加履勘，如能就地伐石，鑿筍合縫，疊成盤磴，外峻內夷，兩旁鑿渠，分釀其流，俾上源節節停滯，層遞下注，則急湍可殺，而昏波可澄。”^⑤

（三）鄭觀應思想所映射出的矛盾性

立足於傳統智慧和近代科學這兩個迥然不同的思想來源，使得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帶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而這種矛盾性既塑造了他思想中新舊交雜的獨特樣貌，也成為了推動其思想發展的邏輯動力。從時間線上來看，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亦展現出了兩種相互影響的趨向，即在其思想內容日益豐富的同時，創新性的特徵也越發突出。

從矛盾性本身的形態分析，鄭觀應水利思想的內容展現出了新舊交雜、傳統和近代相互交匯的複雜樣貌。而在此其中，我們又能發現傳統性和創新性互相結合的兩種不同形式。其中一種形式是傳統智慧和近代理念的深度融合，這種融合創造了具有鄭觀應特色的水利思想，譬如鄭觀應就主張在整治河流時要重點利用地方上的鄉紳來推動各項治理政策，因為士紳們居住於河流兩岸，屬於利益相關方，必然會對治水工作盡心竭力、全力以赴，“然而責之河官不如責之疆吏，責之疆吏不如責之鄉紳，蓋生長聚族於斯，則痛癢相關，不敢自貽伊戚也”。^⑥然而，這種利用地方士紳集團而不是近代化政府的力量來興修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見解，顯然屬於傳統智慧和近代理念相互結合的範疇。

^① [清]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頁27。

^② 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21。

^③ 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88。

^④ [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9。

^⑤ [清]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頁39。

^⑥ 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22。

而另一種形式，則是晚清時期“西學中源”說或者“泰西近古”說的集中體現。錢鍾書曾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這種意識有過比較具體的描述：“蓋引進‘西學’而恐邦人之多怪不納也，援外以入於中，一若禮失求野、豚放歸笠者。衛護國故而恐邦人之見異或遷也，亦援外以入於中，一若反求諸己而不必乞鄰者。彼迎此拒，心異而貌同耳。”^①同樣，陳旭麓也曾經比較詳細地解釋過晚清時期的改革者提倡“西學中源”說的原因：“維新者則往往是迫於某種信息和規範的壓力，唯恐刺傷披髮左衽的民族隱痛，蹈‘用夷變夏’之嫌，不得已而採取權宜之計，為西學在中國扎根創造條件。”^②顯然，鄭觀應在引進歐美先進的水利工程理念和技術時也使用了類似的手法，通過這種方式，將移植自歐美的植樹培土，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土壤水分的近代科學思想附會到古人的文獻記載中去，希圖以此減少引入這些新型理念的阻力，即“夫以上之法皆中國自有之，且盡人能言之，無所為高遠難行、神奇莫測也”。^③因此，鄭觀應在號召積極向歐美各國的先進水利經驗進行學習的時候才會反覆地重申，無論是開鑿溝渠，還是植樹培土都是在中國過去的水利建設歷史中有跡可循的，並不是完全移植自歐美，所以仿照外國的方法也就是效法古人的智慧：“故古者井田之法，必於兩旁種桑：一以養春蠶，一以衛五穀也。乃後人習而不察，罔知種樹，徒事西疇，反不若西人之即物以窮理矣……夫種樹之義，似乎創自西人，實乃師乎古制，亦何樂而弗為哉！”^④

當然，不論是何種形式的結合，鄭觀應的水利思想都建立在其傳統性和創新性的深度融合之上。而正是這種傳統性和創新性相互交融，一體兩面的複雜形態構成了其水利思想的矛盾性的基本樣貌。

而從矛盾性的時間變化上進行分析，鄭觀應水利思想的內容則隨着時間的推移，表現出兩種相互聯繫的趨向。其一是鄭觀應自己的水利思想不斷深入，逐漸完善的變化趨勢。從同治末年刊行的《救時揭要》出發，鄭觀應逐步從急切地回應社會問題，轉為了視野更加廣闊，體系更加豐滿的理論闡述。同時，其目光也漸漸從單純的整治水災任務轉向了複雜的水利工程建設工作。這種趨勢一方面說明了隨着鄭觀應年歲和閱歷的不斷增長，其看待事物和問題的角度出現了變化；但另一方面，這也同樣顯示出伴隨着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和理論的日益成熟，其邏輯框架漸漸趨於完備。其二，在鄭觀應的思想逐漸深化和豐富的過程當中，其思想內核中傳統智慧和近代理念的結合也更加緊密。其創新性的特徵越發突出，並且在新舊矛盾的對撞中逐步佔據了主導地位。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①錢鍾書：《錢鍾書集·管錐編（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1538。

^②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頁360。

^③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17。

^④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89。